

自带干粮去办公 穿着草鞋干革命 夜打灯笼访贫农 中央苏区“第一等工作”是怎样做的

中央苏区时期，针对少数党员干部工作中存在浮于表面、不务实效以及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党和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举措，锻造了一支政治坚定、能力突出的干部队伍。他们扎根基层一线，心系百姓疾苦，秉持艰苦奋斗精神，以“自带干粮去办公，穿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的优良作风，创造了“第一等工作”，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

制定规矩 严明纪律

纪律严明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赖以生存发展的根本。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将不侵犯群众利益作为全体官兵必须遵守的铁律，其形成过程彰显了党的自我革新精神。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荆竹山雷打石首次宣布“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三大纪律；次年攻克遂川时，针对群众反映的门板归还、铺草乱扔等问题，补充“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六项注意。至1929年6月红四军新泉休整时，根据军民互动中暴露的如厕、洗浴等新问

题，形成包含“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的八项注意。

这一纪律体系始终秉持通俗易懂原则，语言表述根据实践不断优化：将“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演变为“一切缴获要归公”，“上门板”“捆铺草”调整为“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最终形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调查研究 求真务实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调查研究不仅可以了解民情，还可以及时纠偏，及时解决问题。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注重通过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工作中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进行了大量的实际调查，如仁风山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注重调查研究的新风。如于都县罗坊区三门滩乡在推销经济建设公债时，发生了摊派、命令、强迫等问题，“该区委、区苏感觉到这问题的严重，立即派人到该乡调查，明了真相后，当即召集全乡党团员及全乡代表大会，严格指出该乡苏李汉盛官僚主义及摊派命令强迫方

式，给了无情的打击……不(到)二天的时间，该乡劳苦工农群众自动的推销经济建设公债一千余元，集中现金九百余元”。

以上率下 示范带头

先进典型可以起到带头作用，中央苏区党的作风建设尤其重视树立典型。毛泽东强调：“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在战争突击动员方面，《红色中华》刊文对十二月突击月的动员成绩进行表扬：“在兴国，瑞金，西江三县造成了不但完成而且超过原定数目的光荣成绩。”同时，把西江突击队的成功经验总结为：“布置了具体的突击中心”，“反机会主义斗争开展了”，“抓住了干部动员了群众”。“在秋收动员方面，《红色中华》刊文指出：“最好的是沙溪区，他们是在各乡组织了秋收队……适当的调剂，因此，虽然秋收紧迫时也不感觉人力的缺乏与空闲，沙溪区的秋收是很迅速地完成了，其次就是潭头、良村等区。”

勇于批评 直面问题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纠正党内不良倾向的重要方法。1929年7

月红四军第三纵队政治部编印的《党员训练大纲》专列一节“怎样批评同志”，为根据地党组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供了方法指导。1930年10月发出的《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告同志书》强调：“现在，我们号召全党同志和各级党部，根据这种精神，坚决的实行对于工作的检查——实行自我批评。”

实行党内自我批评，是保障党正确路线执行、推动党的进步的最有力的方法。这可以防止党内腐化官僚化和其他一切怠工消极不正确倾向与现象的产生与发展。自我批评的内容也会登上机关报，作为警示。如在《粉碎贪污腐化官僚主义傅禄同志的自我批评》一文中，傅禄自我批评说：“在三月中间就是(有)贪污腐化官僚主义实际表现，例如去买米及买菜就私用了公家四块多钱，拿去买表及吃东西，在工作中是不积极的，而是消极怠工，对一般的工作不负责任。”他将发生这些错误的原因归结为“对目前政治不深刻认识”。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苏区的党员干部及时查找自身是否存在的问题，对党的作风建设大有裨益。

钟燕林

文史杂谈 钱穆的“认真”

钱穆1907年考入常州府中学校，期间的两件事，足见钱穆的“认真”劲儿。

学校规定，熄灯过后就不允许学生再说话。有一天晚上，钱穆兴致很高，跟一个同学卧谈，没有顾及学校的规定。不料学监来了，听到钱穆在高谈阔论，很生气，说：“爱说话的同学可以到训导处跟我说话。”同学们一听都不敢吱声。学监说完就气呼呼地走了。不料钱穆真的穿上衣服，跟在学监后面去了。到了训导处，学监才发现钱穆跟来了，惊问：“你来干什么？”钱穆说：“听您的教诲前来说话。”学监差点气晕。

还有一次，钱穆的图画科分数不及格，校长找钱穆谈话，叫他每科必

须平均发展，不得于任一科有所轻视。校长又说：“你今年考试图画得分太低，按照规定本该留级。我已和几位老师商量，可将你得分多的国文、历史两科酌减移补，免得留级。”此时钱穆又“认真”起来了，说：“图画科考试不及格致使留级，我罪有应得，校长爱护之意我也十分感激。只是我平日对国文、历史两课尚知用心，不愿将此两课所得分数减低。”校长一听气得瞪大眼睛。

不过那个时候学校还是非常尊重每个学生的，等到成绩单发下，钱穆发现自己的国文、历史两科分数并未改动，当然自己也没有留级。

顾燕

古代写经人一天要抄多少字

五代后唐长兴五年(934)，敦煌三界寺19岁的沙门道真在《佛名经》残卷(国家图书馆藏BD05788)题记中写道：“沙门道真修此经，年十九，俗姓张氏。”

这份简短记录，揭示了敦煌历史上一场规模浩大的写经工程。

根据多种文书，我们大致可推断像道真这样的写经人完整的一天。

写经人道真谁？每日辰时沐浴焚香，口诵陀罗尼三遍，而后启卷，按每行17字朱丝栏眷抄经文，日限2000字。为确保准确性，道真将《大般若经》等核心典籍配补成足本，并在修复处加盖“三界寺道真修补”朱文方印。

道真的写经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现存52件相关写卷印证了其艰辛历

程。面对“纸墨难得”的实在困难，道真从各寺废旧文书中取材。当时正处敦煌归义军时期，因为频繁的战乱，曹氏归义军政权将纸张列为军事战略物资，由军资库司统一管理，寺院申请纸张需经过严格审批，这使得道真在修复佛经时不得不“寻访破坏经文”，甚至创造性地使用过期地契、军事公文、废旧账目等作为补纸。这种“以废补佛”的智慧，是古代文献修复因地制宜原则的早期实践，延续了“敬惜字纸”的传统。

这位从青涩沙门成长为沙州僧政的写经人，用毕生精力在沙州边陲书写了一部特殊的文明史，他的修复成果最终构成敦煌藏经洞六万余卷遗书的一部分。

屈旷

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

全环境立德树人 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